



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集

王宏

剧作选

王宏 著
第一卷

WANG HONG THE DRAMATIC WORKS SELECTS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集

王宏剧作选

WANG HONG THE DRAMATIC WORK ELECTS

第一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宏剧作选：全4册 / 王宏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1
ISBN 978-7-104-04357-7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戏剧小品—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4②I23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4532号

王宏剧作选 (第一卷)

责任编辑：吴淑苓
特约编辑：肖 力 王梦欢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 版 人：樊国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唱园区L座
网 址：www.theatrebook.cn
电 话：010-63381560（发行部） 010-63385980（总编室）
传 真：010-63383910（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63387810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中唱园区L座
(100055)

印 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12.5
字 数：1000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4357-7
定 价：120.00元（全四卷）

版权专有，违者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行走中的记忆 (代序)

王宏

剧作家出版自己的作品集于纯文学作家出书的意义不太一样，文学家的书大多只有出版了才叫面市，那是文学家作品的首秀（结集再版的不算）。而剧作家的作品大多早已在舞台上完成了首秀的过程，有的甚至一秀再秀，秀到家喻户晓，出书只是为了做一次阶段性总结，为后人留下一些文本，为自己留下一些把柄。

我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剧作家，只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一行业的一个过客，想在这巍峨华贵的宫殿中留下一个影子，但最终只是个免费的参观者。我出版这个集子只是想回顾一下自己这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事情，通过那些模糊的脚印，为下半生找点活着的理由。

也许需要讲一些故事，因为它们与我的人生和创作有关，生活中所有的曲折都是滋养作品的养分，没有感恩就没有感动，没有经历就无法成长。作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而充实，反而恰恰是因别人而精彩。

1962年12月的一个大雪天，属虎的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母亲没有奶水，我父亲出差外地，他不知用什么办法搞到了二十盒炼乳（那个年代炼乳是奢侈品），靠它们，我活了下来。到我懂事的时候，“文革”已轰轰烈烈，身为剧作家的父亲进了五七干校，别人说自己被打进了牛棚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而他是真进了牛棚，去干校养牛。我是跟他去的，一直待

到七岁上学。父亲是个文人，对牛也很人文，他为十几头牛都取了名子：妞妞、老黑、白熊……还有头牛叫“雨果”，我不知他怎么想的。父亲对牛比对我好，夏天，他烧蒿草为牛儿驱赶蚊蝇、牛虻，自己被咬得满身红包。冬天他为牛们生火取暖，怕火半夜熄灭，亦怕火焰太大引燃了草料，他经常彻夜不眠，甚至把自己的棉衣盖在小牛犊的身上。他真爱他的牛，白天大田组的人来牵牛出去干活，他总是千叮咛万嘱咐，有点像元代马致远散曲《耍孩儿·借马》中的那个吝啬鬼，以致别人开玩笑都说：老王的牛是他亲生的。牛病了，要带它到三十里之外的兽医站去看病，他牵牛在前，我踉跄在后，累了就牵住父亲的衣服要求骑牛，每到这时父亲都会背我一会儿，或停下来让我在田埂上坐坐，我坚持对父亲说我要骑牛，他就会急，说：它生病了你明白吗？

不知愁的岁月过得飞快，不知父亲们忍受了什么样的艰辛与屈辱，广阔天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大有作为的，捕鱼捞虾，粘知了，掏麻雀，不亦乐乎，直到上学离开那里还依依不舍……

到五七干校解散的时候，他们又向我描述了一个我似乎不认识的父亲：那天，牛棚前来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他们要把父亲的牛通通拉往屠宰场，父亲疯了，挡在车前，几个棒小伙都拉不动他，他那不叫哭，叫嚎，嚎叫着他那群牛的一个个名子，直至昏倒在地……

牛们最终上了刑场，父亲大病一场……

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悲悯，虽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个词汇。

也许因为“悲悯”造成的多愁善感，大了几岁以后我开始迷上了写诗，（从牛棚里就跟父亲学会了十三道大辙）那时我的偶像是郭小川，（也许郭小川的团泊洼与我的干校有些相同的色彩）我天天写一些那时自己管它叫做“诗”的文字，并立志今后要做个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非此不活……父亲对我说：诗人也要吃饭，你要先有个吃饭的职业才能写诗。后来，父亲带我去市文化馆的锅炉房，拜见了当时还在烧锅炉的，我国著名杨派山东快书创始人杨立德老先生。凭几段快书，1978年12月，我考上了济南市文工团曲艺杂技队（后恢复为济南市曲艺团）。然而，当时团里除了刚恢复工作的我师父，还有著名的中年快书演员及我的师兄一大堆，他们哪个都比我演得好，即便是同时五个人一起闹肚子，也轮不到我上台。于是，我开始看书，学着

写段子。并把写完的段子捧给我父亲看。哪知，父亲看也不看就对我说：小宏，你这辈子可以当个演员，当不了演员可以去当工人，学技术，就是不能当作者……我问：为什么？他半天不答，大约过了三天他才对我说：作品是白纸黑字，运动来了就是证据，打倒你的证据……我当时觉着可笑，但抬眼看他时却陡然发现，说这话时他的眼里竟全是泪……

我当然不会听他的，写，从一个山东快书小段，到琴书大段，中篇说唱，以多取胜，演不演发不发全然不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果然有点儿道理，几年下来，竟有几个作品被搬上了舞台，变成了铅字，有的还获了奖，最大的奖是故事《卷发与光头》获全国故事大赛三等奖；其次是河南坠子《断了的项链》获山东省曲艺汇演一等奖。也许是时代发生了变化，这时的父亲已不再阻止我写东西，他也在老单位省艺术馆干起了专业（《艺术天地》编辑），自然就成了我家里的老师与作品的编者。由于有了几个作品，不，主要是上不了台，我被团里安排到了创作室担任专业编剧。当时的创作室有三个编剧，都是部队转业的，个个水平不低。我自然与在演员队一样，编内的人干的是编外的活儿——打杂。打杂的岁月能写些什么？除奉命撰写了《济南市曲艺团简史》，写的最多的就是日记，在日记本上啥都写，新闻，时势，感慨，谩骂，想象中的爱情，读书的偶得，生活中的轶事等等，总之想啥写啥，信马由缰。有时一写就是半夜，一写就是三五十页纸。日积月累，竟攒了三十几本。那时年轻，精力充沛，光写日记打发不了那么多个短昼长夜。于是，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谈恋爱上。谈恋爱，在那时候当然属于早恋，好在一次性成功，早恋的对象就是现在这个伴了我三十多年的老婆。老婆当年很漂亮，也很时髦，邻居对我父亲说：你未来的儿媳打扮的是不是太那个了。我父亲说：年轻人爱打扮就是爱生活，小崔爱打扮就是爱我们家小宏，女为悦己者容嘛。你听听，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倒是很超前的。我老婆始终记着他这句话，在父亲老年暂居我家时，这位儿媳天天都为公公洗脚，陪他散步，变着花的为他调理伙食，这是后话。

然而，人总不能靠谈恋爱活着，在团里领工资、混日子，你那高贵的头

是抬不起来的。于是，我要求干事，目的是别在家里憋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要下了为团里演出打前站的任务。所谓打前站，俗称“打地”，说白了就是联系演出，全国各地的跑剧场，跑演出公司。你可别小瞧这活儿，这是当时文艺团体赖以完成演出任务，拿到全额拨款的命脉。当时我们外出巡演是要遵循一些规矩的，如：剧团与剧场的分成问题。那时，我们与剧场是三七分成，即：所有演出收入的七成归剧团，三成归剧场，除了吃饭，发演出补助外，所有运输、住宿、宣传、票本等开销均以这个比例各自分担。但这里还有个规矩：从甲地到乙地中间，路途不得超过两百四十公里，如超过这个限度，运输费由剧团全额负担。因此，剧团巡演初期就必须做好点线规划，把所有点与点间的距离严格控制在两百四十公里之内，也就是说中间有一个点打不下来，这条线就断掉了。打前站的人就是连接这条线的关键人物。要想顺利打下一个点，连成一条线，你必须要与演出公司与剧场进行良好的沟通（当时的演出公司管审核批准，剧场管接待剧团，两家哪边出了妖蛾子都会功亏一篑）。这项工作我大概干了两年，起码这两年我们团的巡演没有出现断线的情况。

这两年我行走天涯，阅人无数，不但增长了工作能力，还为未来的创作积攒下了无数资源。我是个聪明人，至少有点小聪明。我出去打前站有一套自己总结的经验。我们团是个市级小团，那时候演出去的也大都是小地方，以县城为多。那时的县城没有现在这么大，人也没有现在多，坐上长途汽车去X X县，车上都是去那儿的人，彼此相识毫不奇怪。因此，一上车我就开始向同路人打听，你们县的剧场在哪儿？演出公司在哪儿？继而就是演出公司经理叫什么？剧场经理姓名字谁？十有八九我都能给问出来，只要问出来接下来就好办了。我可以先去剧场，直接找经理，指名道姓，理直气壮地去找经理，说演出公司X X X经理要我来找你……中国人大多都是怕上司的，不就几场演出吗，签合同。你看，多痛快。反过来，我还可以先去演出公司，说X X剧场的XXX经理让我来找你……你想，演出公司是文化局下属的一个行政机关，他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剧场愿意接，那就接吧，咋，盖章。有了这个章，我再去剧场，剧场经理更没二话，咋，又一个章，全活儿。当然，

我这里说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其实打前站的路上走麦城的事也多得很。

谈恋爱那会儿，我和爱人相约，每周星期六晚七点钟要在英雄山下的一棵大杨树下见面，有一回我去河南省打前站，特艰难，前面说的那些小把戏全不好使。尤其是回程安排，站站有坎儿，甚至差点丢了小命。那天是星期五，为了星期六晚七点前准时赴约，我必须拼命往前赶时间。打下了河南延津马上赶往山东东明。一袭风衣，一个双肩背，我像往常一样从容出发了。我上了一辆河南个体户的车，结果到了一个村子，我们便被赶了下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那车子已绝尘而去。此时已是黄昏时分，我看看即将落下的太阳，再看看那个地方，顿时感觉身上发紧，心头发凉。这是什么地方呀？落日的余晖下坐落着几排干打垒的房子，连棵树都看不到，土房子的墙壁上用石灰画着大大的白圈，白圈里写着“停车起火”四个大字（意思是此处可停车做饭），我想：停车会起火，这地方凶险呀，万万不可久留。另外我还要赶时间，必须马上走。我一个人闯荡江湖，有三样东西是必带的：地图，手电，螺丝刀。螺丝刀负责开罐头，必要时还可以防身。我打开地图，从地图上看，由此地往前不远处就是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东东明县，而黄河上有一座铁路桥。我问当地老人，到黄河边还有多远？老人告诉我：不到十里路。那还等什么？我想：我一小时准到黄河边，过了铁桥没几步就是目的地东明了，走。

谁说的十里地？这十里地让我在漆黑的黄河滩上深一脚浅一脚的一直走了四个多小时，深秋时分的衰草和芦苇在我的腿脚手臂上留下了无数个裂口，我的鞋里全是沙子，脚上起了血泡……半夜十二点，我才朦胧看到了天际间有一片白茫茫的亮光，啊！黄河，我这个黄河边上长大的孩子终于又看到你了……

顺着黄河走，我找到了那座铁桥，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半座桥，也就是说：修铁路的人在几天前或十几天前已经把大桥拆了……

我几乎跪在了河边的沙地上，这时候苍天呀大地呀都不好使，深秋的夜晚寒风阵阵，黄河滩头一望无际，无遮无掩。躺着？在这里躺着会被冻僵。回去？再走回去没那胆量也没那体力。走吧，顺着黄河走吧，万一有个村子……可这完全是当时累昏了头的想象，这里是黄泛区，哪个村子会建在黄

河边上？摇摇晃晃，走走停停，又过了约个把钟头，我的眼前突然一亮，前方不远处竟然出现了一点摇曳的灯火，我加快了脚步。

出现灯火的地方有一只船，大约单人床大小，一个打鱼的老人在收拾着散乱的渔网。我央求老人把我送过河去。老人的回答像戏曲《秋江》里的渔翁回答陈妙常一样：我这船只管打鱼不能渡人。我说我给你钱，我出来是办公事的，公事紧急……反复几次，老人答应了。我上了船，坐在撑船老人的对面，脑子里浮现的全是《水浒》中阮氏三兄弟杀人越货的画面，紧握螺丝刀的手始终藏在风衣的口袋里。小船离岸越来越远，我两眼一直注视着老人和老人手里的长竿，只要他有一点变形的动作我立刻就会跳将起来，先下手为强……这一切当然没有发生，倒是我把这黄河想简单了。黄河号称“铜头铁尾豆腐腰”，在河南段的河面特别宽，水流也非常湍急，小船斜着身躯在波峰浪谷间上下起伏，几乎一直在往下游飘荡，但走的时候长了你会发现，来处远了，对岸近了。就在快靠岸的时候，小船突然被河中凸起的沙丘顶住了，任老人再如何用力小船纹丝不动。无奈，老人迅速脱光了衣服下到冰冷的水中，用肩膀扛船，一下接着一下，船离了沙丘，老人又爬到船上，奋力撑篙……

船到岸边，天色大亮，我问老人要多少钱，老人说：你给一块钱吧。我给了老人五块钱，那时候一块两毛钱能买双布鞋。

走上了高高的黄河大堤，我转身面向黄河坐了下来。蓦地，我发现那个老人在向这边跑着，边跑边挥手，从我这边望下去，老人的身影也就是一寸大小的一个黑点，我站起身来，等着老人，心说如果老人后悔要钱要少了，我还会给他。老人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他跑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地摊开一只手，手心里是几张被汗水浸湿的发票。老人说：这是白天摆渡船的船票，有公章的，三毛一张，我存的，你是公家人，你把钱给了我，回去没法报账，拿着吧……我的眼圈红了，一句大爷，一个谢字都没说出口。这个大爷让我重新认识了河南人，这也是多年以后，我给河南省演艺集团写《老汤》《老街》《老家》话剧三部曲的动力之源。

我上了公路，搭了一辆从小村里开出的没有车门的“嘎斯”卡车，一路到了东明影剧院。经理与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吃早饭，听说我的来意，他烫着

似的一连说了几个不行，又是锅炉坏了，又是票房不好，总之是让我尽快走人。我当时也是急了，顾不得温文尔雅，当众脱了鞋，我指着脚上的串串血泡向他诉说了我这一夜的经历。那经理也是性情中人，啥也没说就开抽屉拿出了合同。签完合同，他又亲自驾驶摩托车把我驮到县招待所。我打了盆热水，把脚放在里面就睡着了。下午一点多，我醒了，想不到睡这么长时间，耽误大事了，还有一个点要去，晚上七点……天呀，我要失约了。我立马退了房，直奔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平阴的汽车。也许不顺的时辰过去了，在平阴，合同签的异常顺利，我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往车站，坐上开往济南的汽车，六点钟到济南，出站坐4路公共汽车，到英雄山差五分不到七点。我刚点上一支烟，就听到了爱人的自行车铃声，灰头土脸的我冲她笑着，嗨，我回来了……

这个故事有点长，其实，生活中这只是一天，生活中的故事要都能写出来，我想那绝不是一本书的事。

这些事原本是载在我那些日记里的，那上边还有很多故事，很多人。可惜，他们都消失在了我们结婚的第二天。

我前面说了，我爱写日记，爱把自己的经历记录下来，也爱在日记里胡思乱想，幻想一些故事，虽子虚乌有，可写的有情有义，有鼻子有眼，那大多属于青春期的躁动。可这些东西差一点就毁了我与爱人的新家。

结婚前，我有意把这些东西都留在了父母家里，这些东西属于光棍时代，它们不应进入幸福的婚房。可我那位善良的母亲不这样想，她认为是我粗心把重要的东西落在家里，就借了一辆小三轮骑了近两个小时，把这些东西送到了我的新家。我办事回来，开门就看到了这样一幕情景：地上到处是翻开的日记，我爱人坐在地上边看边哭，边哭边看，桃花缤纷，杏雨淋漓，惊煞人也……接下来就是不间断地审讯：X X为谁？A是哪个？C从何来？任我三寸不烂之舌也难敌她掐七寸的打蛇功夫。无奈，我只得以打开火炉，焚稿了事。此家中文字狱也。

从看我日记开始，老婆就慢慢变成了我几乎所有作品的第一读者，从普通观众的视角审视，她看东西很有眼力，有时我也激情万丈地读给她听，如果读到那一场她睡着了，我会毫不犹豫的把那一场撕掉。

我天生爱写，却又不得其法，以致越写越多，越写越烂。这时，有个贵人出现了，在搞一部广播剧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山东省话剧院的著名演员薛中锐老师，他告诉我，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正在面向全国各文艺院团招生，要开设一个有大专文凭的影视戏剧专业证书班。经过一大段时间的复习（其实那不叫复习，应该叫学习，因为我只有初中文凭，后来政府还不承认了，要重考），我来到北京参加了考试并幸运地被学院录取。在中戏，我突然感觉眼前的世界变了个样，我的所有经验统统归零，我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记下了太多太多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方法。在这里我结识了班主任路海波老师及徐晓钟、谭霈生等一大批专家和学者，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他们大都青春阳光，才华横溢。在这里，我就像一块干透的海绵，尽情地吸收着所有对我有用的一切，我有些开窍了，我突然感觉我这辈子也许就是为创作而来……

毕业了，当很多同学都在四处奔走租房子找路子留在北京时，我所做的是千方百计弄一张回济南的火车票，因为，我去上学的时候，我的女儿只有几个月大，我和老婆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两百元，老婆一分不留全寄给我，她带着孩子住娘家（好在，我的毕业作品电视剧《死之谷》被学院选中并拍摄，由中央台播出，我得了三千元稿费，为家里买了一大堆的东西）。我想孩子，想象她张着小手向我扑来……可我回到家里时，我想象的镜头没有出现，我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女儿平日见了猫见了狗都喊爸爸，见了我只是吓得哭个不停，就不喊爸爸……

从学校毕业回来，我一直不停地写作，话剧《又一村》、《代理爸爸》，长篇说唱《红线记》等，那时候的写作是完全自主自愿的，没人要你写，当然，你写了也没人要。那时我对上报刊发表作品已无兴趣，就是想把作品搬上舞台。山东电视台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可他们宁愿花大钱请北京的作者也不会对我挥一下橄榄枝，尽管在央视春晚小品出现之前，我写的喜剧小品（那时叫独幕剧）在山东的舞台上就已经很火了。我有些茫然，有种“天生我才未必有用”的感慨，然而，当时的人们谁又会关注你呢？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一本叫做《推销自我》的小册子，我失眠了，立刻翻身起来书写了三十多张稿纸的方案，我要搞一个个人作品演唱会，面向社会，推销自己。

我是个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人，想好了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烧香拜佛，不问前程。搞演唱会，作品不是问题，演员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钱，于是我决定去求那些企业界的老朋友。那些年，我无偿帮他们的单位写作品，搞晚会，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关键时刻该不会不帮兄弟一把，我决定去外地找他们。老婆要上班，孩子没人带，我抱上她就去了车站，先后到了淄博、潍坊、滨州、东营。朋友们很给面子，有的答应出钱，没有钱的也答应给些纪念品，还有个朋友说：你搞活动肯定需要车，我出十辆“依维柯”带司机到场保障。三天时间，我满载而归，化缘化得五万余元，这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我的同学潘超平先生还答应出钱包一场，目的是让更多的济南市民能到现场观看。济南电台著名主持人雪羽先生主动当起了策划人，并联系了电视台进行连续三天的现场直播。为扩大宣传，我们印制了三千张海报，丝漏印制，版画风格，很漂亮。我找了几个哥们儿，一夜之间就把海报贴遍了济南城的大街小巷，贴这么多广告要用好多浆糊，我有个朋友是开豆奶厂的，他专门叫人为我抬去了一大桶食用增稠剂，那家伙，可黏了，粘上去就揭不掉。演出地点也定下了，济南剧院，当时是济南最好的剧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候才有人提醒我：王宏，这活动的主办单位是谁？对呀，名不正则言不顺，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于是，找文化局，那是我娘家。可等我跑去向局长道明了原委，局长的一句话就把我说蒙了：不行，不能搞，局里那么多老同志都没搞，你出什么风头？回来的路上，我的心情糟透了，这么多年，我可一直以为我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他们给我的任务我总是拼着命的去完成，我觉着他们是爹娘，是靠山……现在我知道，敢情我是个后娘养的……晚上，和几个朋友聚在一个小酒馆里，我喝醉了，哭了……当时的山东省曲艺家协会秘书长孙立生先生说：我办，你在曲艺团，曲协也是你的娘家。

主办方确定了，开演前三天，剧场又来了电话，说：你们不能在我们这里演出了，因为局里突然安排了重要演出，是政治任务，我们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我和孙立生又骑车赶到山东剧院，给人家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山东剧院的经理听了特别同情我，当即与我们签了合同，场租只收一半，还决定免费给我们在剧院楼顶做一副通栏广告：《王宏幽默作品

演唱会》，广告牌高约三米，宽十几米……

终于要演出了，我坐在山东剧院的观众席里，静静地观看着节目彩排，来帮我演出的演员都是当时山东的名家。我看着台上，看着他们，看着自己多年来精心创作的一个个作品，想象着即将迎来的数千名观众的大考，心潮起伏……遗憾的是，我只起伏了一小会儿就被人叫了起来，原因是大厅里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城管人员。他们进门直接找我，说我违法张贴广告，要罚款，一张五十元……天呀，数学不好的我此时此刻在脑海里飞快地计算着：三千张，五十元，乘法，十五万……好在来人并没有看到全部广告，他们数到的只有五十三张。我立刻叫人带上钱去接受处理，谁知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去的人回来了，又把钱塞给了我，我很诧异，他说：他们的处长要你亲自去。我？我去干啥？贴几张广告还能把我扣起来？我去了，那位处长一见我就问：你就是王宏？我说我是。他说：你演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演，演的都是我的作品。我把演唱会的前前后后又给他叨念了一回，我说：我一个年轻人之所以要干这一切，就是想证明自己，就是想写更多的东西，干更大的事。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激动了，说：钱不罚了。你给我三张票，今晚我们一家三口去给你鼓掌……晚上演出结束，这位处长一家三口上了台，为我献上了一大捧火红的鲜花……

我命好，总是遇上贵人，活动搞完了，在下楼的电梯里，有个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让我明天与他联系。这人是时任山东电视台台长的曾昭明先生……

活动结束了，我的老团长带着全团老少拿着水桶、铁铲，站在城区一个个电线杆子下，在用力地刮着那些粘上就揭不掉的广告，满脸都是汗水……

活动结束了，留言簿上还剩最后一页，我拿回家对我父亲说：爸，你也给我写句话吧。父亲不假思索，提笔在留言簿的最后一页写道：行下春风望秋雨。

父亲说的春风可能指为人交友，亦可能指自身的努力、学养、修炼，可能还指机遇，一次次机遇如一缕缕春风，后来的一切收获都源于前期的耕耘。

有了电视台这个平台，我的作品如有了扎根的土壤，山东卫视先后播出了我的数十个短剧与小品，其中《泰山人》、《我要上学》、《家书》等都获得了全国大奖。通过这个平台，我还结识了姜昆、黄宏、冯巩、魏积安、郭达、

巩汉林、潘长江、郭冬临、林永健、黄晓娟、尚静、孙涛、范明、范军、周玮、邵峰、尚大庆、张振彬、陈丽娟、范雷、王宏坤、李文绪等一大批良师益友，我与他们中的许多人结成了创作班子，再后来，也是他们把我们的二十多个小品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其中《装修》、《荆轲刺秦》、《你摊上事了》、《吉祥三宝》、《足疗》等小品几乎家喻户晓。

济南的父老乡亲更是须臾不敢相忘，浓浓的乡情、亲情时刻燃烧着我，我把它刻在心里，凝入笔端，为我的家乡，为我的母团接连创作了《泉城人家》、《泉城传说》、《茶壶就是喝茶的》等四部大戏，以此向泉城致敬，向家乡人鞠躬。

不断的积累让我在当地圈子里有了一点小名气，于是济南军区的朋友们也请我去写一些东西。有一天，一位管文化的首长在吃饭时对我说：王宏，在地方干什么，到我这儿来吧。我说：行，你要我就来。说这话时，已是酒过三巡，我并没在意。可几天后我去单位上班，传达室的刘大爷突然叫住我，说有你封挂号信，济南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我急忙打开一看，那里面竟是一份特招入伍通知书。我慌了，这可怎么办？回家与父亲商量，父亲问我：你答应过吗？我说答应过。父亲说：那你就得去，军中无戏言。去？谈何容易，我当时是曲艺团的副团长，创作骨干，局里会放我吗？不去？可如父亲所说，军中无戏言呀。再说，我从小就想当兵，那身威武的军装从来都是我梦里最亮的一抹色彩。去，从那天起，我便走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一次，十次，一月，十月，整整一年，不管刮风下雨，无论有人没人，我几乎每天八点钟准时到文化局门前，到那儿就一个字的任务：磨。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得到的最终答复是：交三万块“培养费”，走人。

那时的三万块钱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拿不出，急的用头撞墙。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众多朋友又对我伸出了援手。那年，我给某电视台搞了一台晚会，晚会的名字叫《中国有一座大山》，同行者中有著名影视导演王文杰（《成吉思汗》、《大染坊》导演），王平（电影《孔繁森》导演），张健（导演、栏目制作人）诸君。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有人提起我当兵的事，王文杰哭了，说我兄弟当兵报国还要交钱赎身，这叫什么道理？他的一番感慨弄得整个饭局上泪光闪闪，王平兄提出要大伙儿凑钱，当时在场的有电视台台长和台里

的文艺部主任……饭后，那个台的台长与文艺部主任、会计一道来到我的房间，说要给我签个合同，给他们搞三台晚会，随后，放下三万块钱……

我带着那三万块钱再次来到文化局。三万块钱在财务科换成了发票，局长在发票上签上了大名。局长签名的发票换回了我的档案，我的档案变成了一套军装。1994年7月，我光荣入伍。

高兴只是一阵子，创作却是一辈子的事。当兵第一天，正好赶上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会操，全团一百多个人，唯一一个用左手敬礼的人是我，大伙儿都笑翻了。从那以后，他们见了我，都用左手敬礼。你想，一个连用哪个手敬礼都需要琢磨琢磨的人怎么去写兵的故事？如何才能与部队生活接轨？我决定下部队去，从一个兵做起，从叠被子、踢正步开始，先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再考虑这片沃土上的耕作。

这一去就是半年，我住在班里，天天和战士们在一块生活，感觉贴得很近，但情感上还是两河之水。因为你是干部，因为你年纪大，因为你是上级机关来的。从他们眼神儿里你可以感觉到，这群年轻人在尊敬你的同时，对你还有一点小小的看不起。当时的烟台警备区海防团有一个两栖侦察队，两栖侦察队的战士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兵王，下海能开摩托艇，上路能驾摩托车，潜水，射击，散打，样样都很厉害。有一次，我看人家在操场上拿酒瓶子往头上开，也拿起一个酒瓶子来试试，结果把头给开了。这一举动虽然很傻，却意外得到了战士们的尊敬。受伤了，多日不能洗头，战士们会抢着为我洗，干洗。和弟兄们混的熟了，他们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亲如一家，无话不谈，心与心的距离变成了零。我开始写他们，并把写他们的故事读给他们听，开始他们摇头，后来他们开始点头，再后来他们把我写的故事拿来对号入座，说班长就是故事里的XXX，被认可的感觉很舒服，我的情绪来了，《障碍》、《特种兵》、《兄弟》、《马鸣风萧萧》，一口气就写了一大批。我感恩这些兄弟，感恩他们走进我的心里，走进我的作品，温暖我的观众，温暖我的人生。

我是个新兵，新兵也有新兵的好处或说优势。当你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更容易画上丰富的图案与色彩，当你是完全的外行时，你对一切都会感觉新鲜、好奇。对一些事，在部队呆的时间长的作家，他可能就司空见惯，觉得

这也正常,那也多见,平淡无奇,主动放弃的东西里面可能也会存在很多金子。新兵则不然,新兵的心中阳光明媚,新兵的眼里星河璀璨。

为此,我得到一条启示:生活没有特殊的,你想发现一个别人都没有发现的事很难,即便有,也不见得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居家过日子,谁家不是普通的生活?不要梦想寻找那些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故事,只有在普通中发现不普通,在正常中体味不正常,把司空见惯演绎成振聋发聩,这样往往能出作品,出好作品。

2003年,我已经是老兵了(主要是岁数大),那时候我创作的军旅舞台艺术作品已达百件,全国、全军一等奖也获了十几个。此时,我接到总部命令,去北京总政话剧团创作室报到。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天大的好事,我这辈子有个梦想,从上初中就有这么一个梦想,那就是搞一部好话剧,像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斯特林堡、莫里哀、契科夫、果戈里等大师一样,人不在了,戏还在……这对于我来说可能仅仅是个梦想,可能直到我死之前最大的遗憾还是这个事。但是,这个梦我一直在做着,我在阅读,我在观摩,我在积累,我在学习,我在实践,我在苦苦寻觅,我一定要写出那个好剧本来,这是我的人生理想。而进入总政话剧团是否会离我的理想更进一步呢?应该是吧。

临行前半个月,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要走的事该怎么向老父亲说,因为他那时已经八十多岁,老母亲在几年前也已先他而去了,正是父亲需要我的时候,儿子要远行了……

然而,军令如山,不管拖多久,总要向父亲开口的,我结结巴巴的向父亲说出了这件事,谁知,他连一秒钟的停顿都没有,马上开口说道:去吧,好事!

41岁进京赶考,2003年5月“非典”过后,我报到了。这之后,我几乎就从来没有停下过行走的脚步,路上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全部都融化在我的作品中。在南方雪灾现场,我看到了那片《冰雪丹心》,在汶川地震灾区,我拥抱了我的《士兵们》,在常年干旱的陡坡村,我找到了《甜水》,在黄沙漫卷的宝塔山,我收藏了《红色珍宝》,在硝烟滚滚的演习场上,我开始关注《兵者·国之大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用作品浸润着我的人生,

用戏剧记录着国家、军队的历史。作品也许写的不好，但我和我的战友们是用心、用力、用命去写作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能忘记一起合作过的孟冰、宫晓东、胡宗琪、李宝群等好朋友、好老师。

2010年12月，我正在全军双拥晚会排练现场，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的病重了。姐姐打电话时，父亲在电话的那头用尽力气故意对我大声喊话，他说：别听你姐的，你听听，我很好，你完事再来看我吧！我说：行……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父亲生命中对我的最后一句话。

父亲话里的意思很明确，他不愿我为他的身体分心，哪怕他早已知道大限来临……他要我做我爱做的事，他要我做他没有做完的事，他要我做更大的事。我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听他的话，完事后再去看他，可我的这个事还没完，我必须去做完它，不然就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颜再去见他……

写的太多了……

可写的再多也写不全我这半生所遇到的贵人，也写不尽我对那些人的感悟、感激之情。

人生如戏，戏即人生，我不想把我的人生变成一场戏，但我愿用我的一生，写好每一场戏，以飨观众，以谢知己。

王宏

2015年9月北京